

錢鋼
文集
自我放逐

湖北教育出版社

钱钢文集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GIP)数据

钱钢文集:自我放逐/钱钢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ISBN 7-5351-3816-0

I. 自…

II. 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0541 号

钱刚文集:自我放逐——钱钢著

出版发行 湖北教育出版社

邮政编码 430015 电 话 027-83619605

地 址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网 址 <http://www.hbedup.com>

经 销 新 华 书 店

印 刷 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武昌岳家嘴特 1 号

开 本 965mm×127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57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51 - 3816 - 0/G·3124

定 价 26.00 元

自我放逐

錢鋼 文集

作者小传

钱钢(1958—2003) 原籍浙江宁波。1982年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先后于1988年、1995年获复旦大学文学硕士、博士学位。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清民诗文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东师大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攻中国文学批评史、儒家思想研究、王元化学术思想研究。曾参加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项目《中国古籍总目提要·诗文评卷》撰稿，国家教委文科重大课题《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撰学术文稿等。独立或合作编著、编选学术著作《中国诗学·第三卷》、《清园文稿类编》、《一切诚念终将相遇——解读王元化》等十余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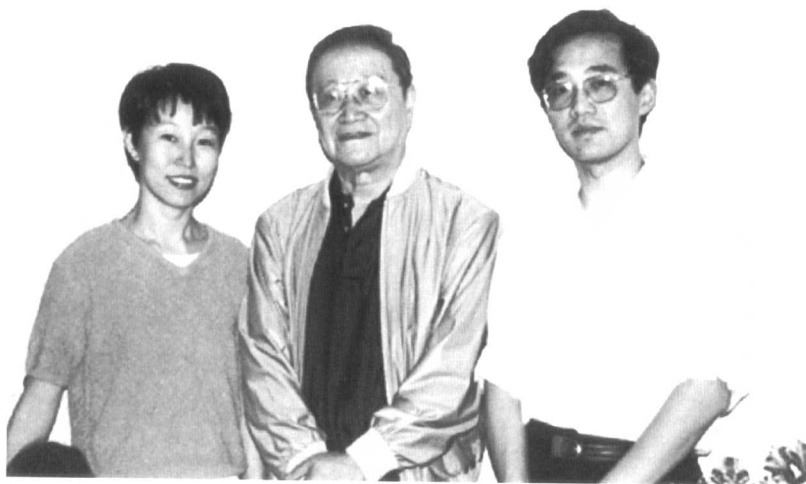
RBA02/12

内容提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自上世纪80年代末至其去世的2003年间所作主要文章，尤以近几年著述为多。除作者术业专攻的学术论文之外，兼及各类书评、札记、随笔等，涉及王元化学术思想研究、儒家思想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对世事风气的剖析批评等。作者以严正的态度、深邃的思考、明净的语言，对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历史，对人生修养，发表了一系列极为认真的意见，极富启发性。作者病逝后，其师友、学生写有情文并茂的悼念文字，亦载于书前书后，俾读者诵其书，想见其为人。



1988年夏摄于王运熙先生家（从左至右：钱钢、周锋、沈波、王运熙、归青）



1996年6月陪同王元化先生接待来访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王梅凤女士



1996年12月6日在王元化先生夫妇举办的宴席上
(从左至右：钱钢、邵东方、王元化、张可、蓝云)



2003年1月摄于上海大学举办的东方诗话国际会议上



1998年春摄于浙江南浔



2002年6月与师友合影（从右至左：钱钢、王元化、俞慰慈、张寅彭）



1997年摄于上海复兴公园

序 —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八日这天，整日下着雨，就在这样一个阴雨绵绵的悒郁日子里，钱钢离我们而去。他从发病到去世只有二十多天，享年四十五岁。

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晓明曾约请几位朋友在庆余聚餐，钱钢也应邀参加了。那时谁也看不出他有病，吃完了饭，还是他送我上楼来的。临行，他转身出门前，含着微笑向我告别。怎么想得到这会是我们的诀别！

十月上旬他发病初，我自己也因病住进了医院，打电话到他家去，接电话的是他的夫人小林。我问钱钢在家吗？回答是一阵微弱似乎带有哭泣的细语，我听不清说的是什么，接着传来钱钢本人的声音。他告诉我他在发烧，肝上发现肿块。我知道他长期被肝病所困扰。半年多前他曾向我说过，他在一家中西医结合的医院看病，医生说病情稳定，没有问题，他自己也表现出乐观，充满自信。但是现在他在电话里告诉我这样一个消息，使我吃了一惊，不知怎么说才好。我只说了一两句自己也觉得是无用的安慰话，电话就挂断了。接着而来的是一连串的可怕的消息，他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是晚期，住进了长海医院。再得到的消息更可怕，他在大量地吐血，脸上和全身泛出肝癌末期病人所出现的黄色，病情在急剧恶化。当时，我自己住在医院里，只能依靠天天去长海探病的文忠，把他的情况告诉我，一直到他去世为止。

十一月十六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是蓝云当天赶来跟我说的。

他的遗体静静地躺卧在一片白花丛中，来吊唁的人多半是他的学生，其中有他曾经教过的、正在教的，还有一些他没有教过的。他们哭泣着向他的遗体鞠躬告别，依依不舍地伫立在灵堂四周，久久不肯离去。钱钢生前性格内向，很少表露自己，从来没有和我谈过自己的成就。但有一次，他带着有些得意的神情告诉我说，他们学校举行了一次不记名投票，让学生来推选他们所敬爱的老师，而得票最多的就是他。此外，就再也没有听他说过他教书的事情了。直到他去世后，他的好友张寅彭把他学生写的悼念文交给我看，我才发现，钱钢竟是这样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我没有想到，他在课堂上是那么生动活跃，善于言辞，趣味盎然，这跟我认识的钱钢截然不同。他在学生面前一点也不拘谨，一点儿也不寡言笑，而是很会说笑话，很会掌握他们的心理。他引导他的学生去爱生活、爱学问，去做一个富于人性的真正的人。我读了十来篇他学生写的悼文，这些文字句句都是爱，字字都是至情。这些可爱的孩子在倾吐难以抑制的伤痛的时候，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纯真和质朴，令人读后，怎不感动？如今我已入耄耋之年，在这熙熙攘攘、上下征利、人情浇薄的世上，犹能见到这样一批不同于赶时髦的庸众俗流，而是有头脑、有品格、有追求的青年，真是感到高兴。我不能不说，从他们身上也显示了中国的未来希望。钱钢在教育上默默耕耘，虽然很少有人知道，但目前的大学正需要这样淡泊名利、勤奋敬业的好老师，尽管他的工作、他的价值，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被漠视被埋没了。

我和钱钢最初认识是在一九九〇年。他的父亲是我四十年代初所教过的学生，可是我们并没有什么来往，而钱钢却成了我青年朋友中的知己。我们无话不谈，他理解我，不会因为我说话不慎而对我产生误解和猜忌。他也不像有些人怀有某些实际目的，或言不由衷，或虚与委蛇，而缺乏真情实意。像他这样的朋友，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他逝世后，我写了几个字以表悼念，其中四个字是“至感痛惜”，这几个字虽平常，却表示了埋在心中的哀思。多少年来，朋友的去世都使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悲痛，不过时间一久，也就逐渐平复下去。但钱钢的死在我心上留下的伤口，恐怕很难愈合了。

我最初认识钱钢时，对他的治学并不怎么重视，但后来情况有了

变化。最近这两年，我感到钱钢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他是从文学批评史跨到文化研究领域里来的。进入这一新领域难度很大，对这点我有切身体会。钱钢是个认真的人，他不怕钻研之苦，但他有个和别人不同的困难，这就是他的身体。我们来往一直很频繁，但有一度，大约是三四年前，他突然长久不来了。我打电话问他，才知道他得了肝病，而且这种肝病是他已故母亲遗传给他的。虽然钱钢时时想摆脱肝病对他的威胁，但事实上，这种病是致命的，所以，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在他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发奋治学，就不得不受到阻挠。他不能像别人一样拼命熬夜，一时身体垮了也还能够恢复。他要是在治学上钻励过度，就将酿成大祸，所以他不得不小心。他能作出最后两年那样的成绩，是不由人不感到钦佩的。去年第九期《博览群书》上发表的他的论文，大概是他最后的几篇作品之一，只要把这篇文章和他以前写的同类文章相比，就可以知道他为这种进展曾付出过多少努力。

钱钢近年来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我们经常一起谈论这方面的问题。就我的记忆，似乎我们没有谈过张载。不过我相信他会喜欢张载下面的这段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有人说张载此语胸襟广阔、气势恢宏、境界崇高、超迈千古，可为中国士人重建精神的家园。文忠告诉我钱钢临终向亲友诀别时，显出了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详。为什么会这样？张载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这样一种人生观，一种对生和死的态度，是需要一个人以一生的行为来贯彻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使命，才能实现的。我想，钱钢努力去做了，他才在最后的日子里显得那样安详和平静。

王元化

二〇〇四年立春日

序 二

我与钱钢是相知甚深、情同手足的好友。这次，在他遽然去世之后，准备出版钱钢文集的湖北教育出版社方面向我重申了他生前的提议，由我来为他的自选集写序。我感到了这个嘱托的无从推却的分量，这一支笔握来犹如铅重。

二十多年前，我们同学于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时“文革”刚结束，他属于“小龄生”中并非最小的一个，我则是“大龄生”中的尚非最大者。由于同级而不同班，同学期间我们并不相熟。毕业后，还是经胡河清居中介绍（他与河清同班），我们才正式交往起来的。也不知凭藉甚么，河清从一开始就预言我们可以成为终身的朋友。一九九五年他在复旦修完博士学业后到上海大学文学院任教，次年我也从上海教育学院来到上大，从此我们又多了一层同事关系，相处在公共与私谊的双重空间之中。这使得我们在此后的岁月中，十分难得地能够在公私两个领域内巨细无捐地互相感知着对方。未料他此番中道而逝，将一个理性地追求和谐且已达到很高境界的形象，过早地定格在我的印象中，岂非老天弄人！

钱钢身上最引我深长思之的，就是这一份“理性和谐”的气质。他留下的文章不能算多，但几乎每篇都合乎理性的适度，给人以信赖无欺的启示，读过以后会助你再思，让你生出一股幸未轻易放过的庆幸之感。

我所谓钱钢的“理性和谐”，是指他的抽象思辨活动由于渗透着现实关怀的激情，于是思辨的冷静与关注现实的热切就像盐融于水那

样，达成了一种有机无痕的平衡，是一种活泼泼的有生命的理性，完全改观了常言所说的那种“生命之树”与“理论之树”分立的“两棵树”现象。比如他选定的研究范畴，他能同时将当代的王元化与传统的诗学思想以及儒家思想并列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无扞格之病，表明他胸中不存在一般横亘于古今之间、感性与理性之间、文学与思想之间、思想与学术之间种种人为设置的理障。他的王元化研究具有深邃的历史感，他的传统课题的研究则没有陷入历史的封闭之壳，而能畅通于现代社会的各种现实问题。

理性和谐的实质，主要在于研究者主体与被研究对象相契而达成平衡，这是个说起来都能明白而做到却十分不易的道理，研究者盲目凌驾于研究对象之上或者无力完全认识对象的失衡现象绝非少见。钱钢的文章则平衡得极为出色。他作为思辨主体的认识能力，每每能如水银一般随形流淌在客观对象整体的各个部分，既不溢出，亦无不及。我们看他评价王元化的两篇长文，《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可谓由遍摘王先生的文字组成，《一个沉潜自在的通儒型思想家》又可谓遍摘了各家评价王先生的文字，他的认知主体如此自信地穿行过了客体对象的几乎每一个角落，由此复按而出的结论自然也就特别周延。其他如论述三纲五伦、中庸之道、学术关系、诗学与儒学关系、传统与现代关系等题的各篇文章，主体与对象一般也都达到了高度的契合。钱钢的见解实际上极具锋芒，但现在人不觉其芒刺，反而服其中肯，乐其和煦，我以为跟这种充分的客观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钱钢愿意把这个主客体之间不断调整达到的平衡界定为“理解”，而不赞成归之于“智慧”、“方法”等技术层面的因素。他曾借解释胡适之师白尔的那句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区别了理解与智慧的不同：

这不是智慧，辐是理解。以容忍为智慧是一种太极招数，没有是非感……以容忍为理解则是一种学术姿态，一种诚意和胸襟，是真正学术自由的前提。

这里颇能表明他的理论素养的纯度。就认识活动而言，“理解”必然

内在于主客体双方及其关系之中，因而是稳定的，也是合乎理性的；而“智慧”、“方法”之类则带有不确定性，既可能内在也可能外在于主客体，并不必然保证能够达到正确的认识，在不正常的学风条件下，有时甚至还会造成某种负面的结果。而钱钢探究对象未知奥秘的动机完全是纯粹的，他曾说过，他如果没有关于对象的“问题意识”，就不会产生从事研究的动力和激情，此外并无任何其他外在的功利目的。这种态度决定他只会老老实实在地理解对象，而不会拨弄智慧、方法去猎取对象，还原了学术诚实和单纯的品格。在这部文集中，他不仅自己是这样做的，我们还可以听到他不厌其烦地呼吁人们回到这一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上来的沉重的声音，不啻是对目下花里胡哨的学术界所下的一帖清醒剂。

我应是受他理性和煦之惠最多的一个人吧。这里谨记下一桩往事，以见其一角。那是一九九五年，我因此前深为王元化先生反思五四而揭出“工具理性”、“意图伦理”等激进思潮的根源所激动，故一时反而不能满足于王先生当时提出的“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之主张，竟冒昧地吁请王先生进一步提倡“纯学术”。拙文写作时未及告知钱钢兄，事后他才与我有过几次面对面的讨论。他自然是服膺王先生的主张的，但也试图理解我的想法，并认真地以戴震“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一语加以肯定。与他的讨论是十分有益的，使我反省到身上存在着由学术长期意识形态化造成的恐惧“思想”的非理性情绪。大凡此类讨论，无论与何人，他都能秉承公心而不带私交色彩。而他对思想与学术的关系以及学术“纯度”等的思维向度极为开阔，见解远为深刻。在此后的数年里，他就此陆续写出了《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从纯学术到科学精神》、《学术与社会效应》等一系列专文，详尽地阐发了王元化先生的思想，客观上也成了他本人对于整个九十年代国内学风作出的一次深入的检讨，涉猎之深广，已非我的初衷所能虑及。在深受教益之余，也自然引起我对自己理论上的浅尝辄止感到惭愧不已。多年来，与他的思想交往每能带来类似的身心愉悦与进步。

在他去世的二〇〇三年，他以抱病之躯，在不足十个月的有效时间里，令人惊讶地写下了超量的文字（当然非时下写手一年写几本书